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多样化

——访加拿大高等教育知名学者格兰·琼斯教授

本刊记者 黄复生 魏志慧

【编者按】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多样化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加拿大作为一个地域广阔,高等教育也因此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地方差异性,同时作为发达国家,加拿大高等教育在国际化方面也走在比较前沿的位置。本期我们采访了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措施,对同样是高等教育大国和高等教育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将有很多有益的借鉴。本期我们有幸采访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格兰·琼斯教授,期望能在更全面地了解加拿大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深入理解其高等教育。

格兰·琼斯(Glen A. Jones)教授是教育学博士,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

www.cnki.net

法是错误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为理解高等教育政策,首先要广泛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加拿大高等教育:不同体系与不同视角》一书尝试从各省具体的背景去介绍和分析加拿大的高等教育。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地方差异性,您还说到要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宽广的背景下来理解教育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您的这一评论很感兴趣,您能够为中国读者详细地解释一下“多样性”、“地区差异性”和“背景”吗?

琼斯:多样性意味着不同点。在研究高等教育体系中,我们对不同层面大学的分析非常感兴趣,大学不同意味着不同的教学和教育哲学,而只由一所单一的、巨型的大学提供所有教育的高等教育系统是无法想像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可以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一种可能是聚焦在理论和研究的传统大学,另一种大学更多的是聚焦在与本地经济相关度非常高的应用性的职业培训项目。在第二种系统中学生能够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和兴趣的机构。一些机构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包括世界水平的研究性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专注特定研究领域的学院和开放式入学的机构。随着各种机构参与加拿大高等教育的程度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在加拿大各省份教育机构的多样性会更大。

就像中国一样,加拿大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有许多重要的不同性。这就是我所说的地区多样性、差异性。我居住在一个高度工业化、人口密集的地区。在这里,经济的发展需要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来服务于金融、制造以及服务业。多伦多的人口具有多元文化性,有时候在我去上班的路上能够听到人们说着多种不同的语言。相比较而言,让我们看看加拿大北部地区。加拿大北部地区从地理上看比印度还要大,但是一个大型运动场就可能容纳西北行政区(Northwest Territory)和努那法特行政区(Nunavut Territory)的总人口。关键是不能不相信的地区差异,而且这两个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满足地方不同的需要。事实上加拿大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决定都是在省级或者地区层面上做出的,这就意味着在努那法特行政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模式就和我工作的多伦多市区有很大的不同。本地的省政府为满足地方的需求能够设计出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

我的信念是:为了研究和分析高等教育,我们需要理解机构和他们身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背景”。一些人假设加拿大的大学将会和美国、中国或者德国的一样,而且所有这些机构可能具有相同的特征。同样,由于这些大学是处在具有不同文化、历史、经济和传统的社会中运行的,肯定也有许多重要的不同。我想大部分加拿大人相信高等教育如此重要以致于不能落后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只有少数私立大学的原因——而在我们的邻居美国则有数量巨大的私立大学。为了理解加拿大

魁北克省的高等教育,你需要感激法语和魁北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我想,为了理解高等教育系统就很有必要去研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背景。

记者:距离您的《加拿大高等教育:不同体系与不同视角》一书初版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们很想知道这十年来加拿大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又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另外您能否和我们的读者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加拿大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的?

琼斯: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最近十年加拿大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林荣日教授和我讨论将该书翻译成中文版时,我们讨论决定我应该写一个新的结论性文章来介绍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最新进展。

我认为,加拿大高等教育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差异的加大和对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新投资。曾经在大学和社区学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但现在这些界限正日益变得模糊;好几个省的大学现在都提供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同时还提供两年和三年的文凭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些社区学院现在与大学合作提供联合培养项目,在这些项目的开展中出现了一些创新之处。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联邦政府通过诸如“加拿大研究席位计划”(Canada Research Chairs Program)、“加拿大创新基金会”(Canada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等创新机制对研究型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加拿大研究席位计划”通过在本国的许多大学设立新的研究席位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科研人才到加拿大从事研究工作;加拿大创新基金会将对研究基础设施(如新的实验室、设备等)进行投资。这些变化都将对加拿大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对诸如加拿大这些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的国家来说,趋势是除了关注本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外,还要重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换句话说,我认为当高等教育向所有申请者敞开大门时就到了一个高等教育扩张的时刻,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新措施来确保不让某一特殊群体落下。加拿大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只有很小一部分加拿大原住民未接受大学教育,残疾学生亦是如此,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也明显少于中产阶级的孩子。各省正面临采取不同的创新措施增加这些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意味着特色教育机构的产生(如位于萨斯喀彻温省的第一大学,First Nations University)、扩大入学率的新举措(包括发挥当地社区学院的作用开展教育项目)以及采取措施提高那些成功完成高中教育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第二个趋势是采取措施增加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流动性,使学生能从一所大学转入另一所大学,或在新的求学过程中以前的学历证明能被承认。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后

接受预科教育或获得一个学历证书,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在寻求职业生涯中的更好发展或转换工作时将重返学校接受进一步的深造和学习。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有关教育项目和机构的网站,从而使学生与项目和教育机构之间建立联系,并能相对自由地在教育机构之间流动。欧洲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学生在国家之间的流动性,如创立学分互认机制。加拿大好几个省的政府部门建立了政府理事会(Government Councils),以促进本省大学机构之间的学分互认和转换。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认为学分转换将提高终身学习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

有些高等教育机构反对学分互认。这些机构认为,如果承认其他学校授予的学历证明或学分,自己学校的地位和声望将会降低。还有一些机构认为,通过远程教育课程或计算机辅助教学获得的学分不能与传统课堂教学获得的学分同等对待。我不认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任何大学都承认其他每所大学所获得的学分的时代,质量控制问题和大学等级、地位的不同将始终存在,在讨论学生流动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另一方面,认识到先前的教育不被承认或要求学生接受不必要的课程和教育时政府和学生个人所承担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扩大入学机会和开展远程教育的“开放大学”在促进和鼓励学生流动方面将发挥特别的作用。阿萨斯卡大学(Atabasca University)在阿尔伯塔省(Alberta)和加拿大其他各省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记者:作为加拿大高等教育学会前主席和《加拿大高等教育》杂志的副主编,您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看到,您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制度、政策和管理,对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制定过程尤感兴趣。除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外,您还对大学内外影响政策制定的施压群体和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感兴趣。您能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发现并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决策这一课题的?

琼斯:我的第一个学历是政治学领域的,我认为在该学科所学到的思想和方法论对我的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自从我认为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系统政策决定中涉及多种因素时,我发现“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概念非常有用。这些因素中的一些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正式组织的作用,而另一些因素具有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如顾问、拥护者、批评家。我对分析这些政策网络在加拿大各省的作用和机构治理在大学内部的作用非常感兴趣。我认为,通过从司法和机构分析政策网络的差异,我们能从政策及制定中学到很多,如与中国大学相比,加拿大大学的教授在学术决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加拿大大学的治理结构通常吸收教师和学生参与决策制定过程,事实上每一所大学的董事会至少包括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除这些正式组织外,教职员工联盟经常通过非正式过程和网络影响决策制定过程。这

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他们对大学内部的决策制定、考虑不同的选择以及这些非正式网络影响正是权力人物使政策实施发生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提到“政策网络”是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您能够告诉我们在分析教育政策的时候如何应用这个概念吗?能否举些例子呢?

琼斯:一个组织架构图可能表明了由教育部长负责决定是否创建一所新大学,但在大多数决策中,教育部长是根据研究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咨询专家的意见做出决定的。决定可能也包括覆盖了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广泛讨论,例如处于一流地位的大学校长或教职工代表。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部和最后的决定,更要关注卷入决策讨论过程中的个体和组织网络。在一些决策中,政策网络可能仅仅卷入了给部长做决策咨询的政府高级官员,但在其他的决策中,可能有一个高水平的相当开放的政策咨询网络。两种不同的政策网络形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决定,理解这些网络的本质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特殊的决定是那样做出的。如果我们研究和高等教育政策有关的政策网络,我们可能对下面的问题获得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不是其他的呢?为什么这种类型的问题受到了如此多的注意而其他问题却被忽视了?

记者:2005年,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您与其他两位学者合作出版了《创造知识,巩固国家:高等教育角色的变化》(Creating Knowledge, Strengthening Nations: The Chang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在该书中,您试图通过分析大学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以及实现平等和再分配正义(redistributive justice)等社会目标的方式来加深人们对全球化对大学影响的理解。书中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内外部力量是怎样施加压力以改变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大学是怎样处理这些压力的,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远程教育或在线教育作为一种能够便捷地提供跨境高等教育的模式,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琼斯:我认为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不同的,但两者是互相补充的概念。我认为全球化是伴随着允许自由资本流动的、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系统,以及全球通信和运输而产生的现象之一。而国际化则是政府和机构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多元文化而采取的策略,这包括从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到课程的国际化等方面方面的内容。全球化鼓励机构进行国际化。

我认为大学教授在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教授拥有国际化经历,他们就可以通过讲课和讨论会与学生分享这样的经历。可以肯定的是,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久我还将去挪威的奥斯陆

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这些都是重要的专业发展机会,有助于我积累高等教育方面的知识,而且,我从每次互动或访问中所学到的东西有助于我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中国政府在访问学者项目方面进行了一些英明的投资,提高了有国际化经历的大学员工的数量,我认为这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成份。

此外,新的信息技术在国际化进程中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认为不同类型的机构利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新技术应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用于支持远程教育,无疑,这些技术为地理分布分散的人群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学生可以参加其他国家的大学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提供的课程;即使他们没法去其他国家,他们也可以获得国际化的经历和了解。但是对于那些最精英的大学来说,新的信息技术同样也在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他们可以组织主要的视频会议讲座,并邀请一流的学者参与,或者将新兴通信技术作为国际化研究合作的基础。我认为,我们仅仅刚刚开始了解那些可以利用技术推进教育目标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利用技术促进远程教育,以及加强课程的国际化、提高学生和员工的接触机会等等。

远程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加拿大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是地球上第二大国家,但是人口只有三千三百万。大多数的加拿大人都居住在南部的主要城区。加拿大政府和机构一直在努力寻求最好的方式,以满足那些居住在远离大学数千里地的人们的教育需求,并在远程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最近,加拿大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打算创建有所托管的新的专门的机构,通过整合传统教育和远程教育,服务于这些北部人群。例如,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很有创意地解决了在职人群的教育需求。

因此,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提供了满足当地人士以及国际化需求的机制。我们从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中所学到的内容之一就是本地和全球是同一次对话的一部分。当前,本地或区域层次的经济参与意味着参与全球化经济系统,因此,国际化解决了本地的、国家的需求。

记者:您刚才提到开放大学在促进和鼓励学生的流动方面将发挥特别的作用。众所周知,目前远程教育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想知道如果人们接受了加拿大远程教育机构所提供的远程教育,那么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上能找到同样好的工作吗?

琼斯:我认为你如果获得阿萨斯卡大学的学位,会受到尊重的,拥有这些学位的人一定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工作。同时需要指出的就是,阿萨斯卡大学吸引的学生不同于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如果你已婚,而且正在该省的北部地区工作,参加阿萨斯卡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可能是你修完一个学士学位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刚刚

高中毕业并想进入全日制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觉得阿尔伯塔大学是更好的选择。这两类学生可能都是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将选择能最好满足自己需求的学校。

加拿大大学系统并不像中国的大学系统那样是分等级的。加拿大大学的本科学位在质量方面一般都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声誉和资源。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加拿大学生可以参加其他国家大学所提供的远程教育课程,那么,目前对这些大学的远程教育是否有相应的质量保证系统?这些学生远离他们的导师和学校,该如何保护他们的利益?

琼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远程教育可以是当地机构,也可以是远程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学习项目的一部分。例如,我所在的一个团队组织了一个每月一次的视频会议,邀请了来自全世界的特邀演讲人,这样我们在多伦多的高等教育项目的研究生可以从这些可能位于英国或香港的演讲人那里受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帮助我们的学生获得来自世界的知识。

对于那些有兴趣参加其他国家学习项目的学生来说,质量保证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领域并没有国际标准,因此学生需要质疑这些项目是否经过当地政府或机构的认证或评估。有些远程教育项目是很好的,他们为学生提供了向优秀教师学习,以及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学生一起参与电子讨论群的机会。不幸的是,也有一些远程教育项目只是用来赚取那些没能很好的质疑这些项目的学生的钱财。保护这些学生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励他们成为谨慎的消费者。他们需要调查这些机构,了解其将使用的教学方法,并和其他学生交流他们的经验。

记者:最后,能否谈谈目前您的研究兴趣?您未来有什么研究计划?

琼斯:目前我正在研究好多个项目。我还和两个同事一起编辑一本书——《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希望能在明年出版该书。我一直在研究一系列政府政策方面的项目,这些政策旨在提高非代表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我还参与了一个项目,调查加拿大大学教授的职业、背景和态度等方面的内容,大概明年我们将会分析这些数据。

关于未来的研究计划,我想研究高等教育中的中观管理,因为我认为这些职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连续性的规划以及我们学术管理人员的专业发展。最后,我还想开展研究项目关注联邦政府中的高等教育,这是因为我认为像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采取联邦制的国家,存在一些与联邦制相关的很有趣的动力学,这都需要进一步了解。我认为,对这些联邦制国家高等教育的比较分析将是一项非常有趣的重要的研究。

谢谢《开放教育研究》的记者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让更多读者了解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机会。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

www.kint